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从现象学到后现代

蔡铮云 著

商務印書館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从现象学到后现代

蔡铮云 著



创于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现象学到后现代/蔡铮云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08586 - 1

I. ①从… II. ①蔡… III. ①现象学—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146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从现象学到后现代
蔡铮云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586 - 1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1/8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为后现代探寻出路——序蔡著《从现象学到后现代》.....	1
自序.....	5
前言.....	1
导论.....	8
一、何谓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8
二、争论的内涵、源起与特色	11
三、现象学对后现代的哲学定位	14
四、断裂中的连续	21
第一章 同质异形抑是异质同形?	
——从梅洛－庞蒂来看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关系.....	23
一、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的困惑	24
二、另一种诠释的策略	27
三、困惑肇始的问题	30
四、梅洛－庞蒂的解决之道	33
五、现象学方法与后现代诠释	36
第二章 海德格尔与后现代——其哲学转向的再议与疏通	40
一、早期海德格尔论存有之真	42
二、转向于艺术本质的语言	45
三、“海德格尔事件”	49
四、批判现代科技的晚期海德格尔	51

2 从现象学到后现代

五、德里达解构的内在颠覆	55
六、后现代的哲学议题	61

第三章 现代与后现代争论的厘清

——利奥塔与哈贝马斯争论的发生分析	65
一、现象学的发生分析	66
二、现代与后现代争端的开启	69
三、后现代言说	72
四、实用主义的折衷调和	76
五、利奥塔前卫艺术式地回应	79
六、后现代的哲学论述	85

第四章 现代性的两个面向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与韦伯	88
一、现代性是什么？	88
二、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哲学界定	92
三、现代性的危机与蜕变	95
四、批判现代化的现代性	99
五、平实与崇高的现代性	102

第五章 文艺现代性的哲学意涵

——本雅明与阿多诺的辩证	105
一、现代与后现代的艺术哲学观	105
二、阿多诺的音乐哲学	108
三、阿多诺的现代思维	112
四、本雅明的大众文化观	116
五、本雅明的后现代启明	119
六、艺术取代了哲学	123

第六章 后现代的哲学论述是如何可能的?	
——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构	129
一、后现代的反人文主义	130
二、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133
三、胡塞尔现象学的困境	136
四、德里达如何解决胡塞尔的难题	140
五、衍异的后现代意涵	143
第七章 后现代的哲学论述是什么?	
——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倒转	147
一、“何谓启蒙”的第三条路	148
二、科学史哲学的颠覆	153
三、考古学论规范结构	157
四、尼采式解读考古学到系谱学的转变	159
五、系谱学之实效历史	164
六、主体伦理学的后现代哲学论述	168
第八章 自我与他人	
——科学的弗洛伊德 VS. 哲学的弗洛伊德	172
一、从主客二元到自我与他人	174
二、科学与哲学的争论	176
三、心理学自我的真实意涵	179
四、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交错与异化	183
五、他人之为心理学自我的基础	186
六、结论	189
附录 二十世纪末的西方哲学	191
一、一种不以人为本位的人文科学	192
二、二十世纪的知识论断裂	194

4 从现象学到后现代

三、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跳跃.....	197
四、二十世纪末的西方哲学.....	201
五、结论.....	205
跋 问题与答复.....	206
参考书目.....	213
索引.....	226

前　　言

1989 年我自美国杜奎森大学 (Duquesne University) 取得学位返国后，便在台湾政大哲学系任教。第一年开了“哲学概论”、“结构主义”、“德国观念论”、“西洋当代哲学”四门课。这些课的分量都相当吃重，令人困扰的是它们的异质性也不小，例如，结构主义与德国观念论，两者不仅风格上迥异，就是关切问题的角度也是南辕北辙。更糟的是，这些又大都和我博士论文撰写的题目：《主体间性——胡塞尔与梅洛－庞蒂》(Intersubjectivity: Husserl and Merleau-Ponty)——有段距离。当时的压力很大，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搜集资料，充实教材，我不得不把原来的研究方向暂时停顿下来，转向思考这其中可能有的交集与共同的主题。

几经思虑，我采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争论”作为统合各个分歧论题的主轴。因为，一方面这个争论涉及层面之广几乎无所不包，我所遭遇的困扰与感受到的荒谬，似乎只有这个大而无当的议题才忠实地反映出来；再方面，我原先研究的论题也开始触及到这个争议，比方说，胡塞尔 (Husserl) 的互为主体性究竟成不成立？为何对大多数的反对意见而言，这个问题非但不会因为他们的异议而失去重要性，反而更能因此体会到其划时代的意义？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 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带有多少后现代的色彩？其晚年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向如何能够沿着胡塞尔的脉络发展出来，而不是一般承继海德格尔的路线所致？其意又何在？这些问题显然都可以和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连成一气来探讨。

2 从现象学到后现代

一旦确定了这个主题之后，我在往后所开的课与研究的兴趣就围绕着它去进行。不知不觉之中，五年过去了。这个原先只是为了串连不同性质课程设计所做的权宜之计，如今却变成我思考问题的重心。除了在大学部与研究所陆续用瓦蒂莫(Vattimo)、德里达(Derrida)等人的作品开过与后现代哲学有关的课程外，我同时也用过哈贝马斯、詹姆逊(Jameson)、泰勒的代表作，处理现代哲学与相关的课程。令人欣慰的是，处理这些争论的同时，非但不曾让我原先研究的方向荒废下去，反而使我有机会重新去检讨现象学的发展，诸如：胡塞尔、梅洛－庞蒂、舍勒、哈特曼等不同风貌的现象学，更因为顾及主题论证的周全性，我开始涉猎过去较陌生的一些领域，诸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巴什拉、库恩的科学史哲学。如今这些研究与教学或多或少都累积些心得出来，所以才会动念出书。

然而，这里头所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大了，许多重要的问题都只能点到为止，必须通盘熟悉它们彼此之间的各种可能关联之后，才能做出有效的疏通与评估。那么，为什么我现在就迫不及待地要出书呢？这主要还是因为现代与后现代争论的缘故。原来，其主题特色尽在于斯，即在无法立即对它下定论之际，一切看起来都只是些诠释与揣测；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难道我们就此束手无策了吗？

诚如上述，我就是在现实处境中遭遇到这个问题而涉及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的，此刻，又由于不断找寻解决之道而产生些个人的想法。不过，从哲学的观点去看，虽然处理问题并不至于有无解决之道，但光是些想法也是不够的，故我写这本书的主旨除了表达个人的感想之外，更要讨论此问题必须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才不会失去其本来的面貌。就此而言，尽管本书所涵盖的层面可能还不够完全充分，但已不至于有管中窥豹之嫌。可是，我们会不会因为采用哲学一贯的方式，来表现世纪之交所产生的种种令人迷惘景象，而造成

超越俎代庖的偏差呢？不尽然。因为这其中所论并非全然是推论的结果，相反地，大部分是我在现实生活世界里仍继续不断在反省思索的。故表面上本书对问题的讨论不离传统哲学处理问题的模式，但由于它是从问题自身表达的方式去反省，早已脱离了学院派自以为是的盲点。

这样的讲法会不会过于空洞与主观呢？对从事哲学反省工作的人来说，这将是永远要去提防，却始终无法一劳永逸可避免的。就现代与后现代而言，它们所争论的焦点其实就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用这同样的问题回头来检讨我对这个问题处理的合法依据时，看起来是正中我的要害，无法自圆其说了。然而，或许在理论上，这的确是个无解的吊诡，可是，就所处理的问题而言，它非但不会因此构成困扰，反而增加了其可信度。

怎么说呢？为了印证本书所提出的观点，上学期我特别在研究所开了一门“海德格尔哲学与政治”的课程，尝试用当前政大选校长、省市长选举等周遭实际发生的问题，来诠释海德格尔事件的哲学意涵，再用海德格尔对自己政治遭遇所做的辩解，来解读存在于我们现实情景中的种种符码。原来，今日“海德格尔事件”所引发的争论，早就跨越了传统理论与实践哲学的分际，蔚为后现代景观之一；并且在这个问题的洗礼之下，我们不得不从实质议题中进行哲学的探讨。经此印证，我发现，只有用上述这种交叉处理的方式才能跳出一般纯理论性介绍的主观与空洞，因为唯独如此把问题倒转过来看，即把这么一种不得不处理的方式当做问题去反省，才能呼应学院派对后现代所做的严格哲学之要求。职是之故，即便本书最后仍旧可能受到传统哲学观点之限，这也必须由言说与其意涵之间的互动关联来透露，而非由预定的或归纳的结论所穷尽。虽然，如此的说法仍有待学者评断其价值，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感到这其中迟迟未决的诡异似

乎要比预先清晰的说明更能体现出哲学的真谛。

* * *

本书的内容，除了前言与导论之外，一共分为七章与一个附录。为什么有附录而无结论呢？这并非我刻意要表现什么现代主义的手法，只因为如此庞大笼统的议题一如上述正在持续发展之中，马上要为它做个定论，不仅言之过早，而且言过其实。反倒是书中各章节的划分与安排，蛮有几分后现代的味道。因为我并非一开始就有这本书的构想，相反地，大部分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皆为独立成篇的作品。因此，只因为现在收集成册，贸然加上一个结论；我觉得，虽然不至于有画蛇添足之嫌，却也不甚真实且无必要，不如让各章节的论述自行告诉我们本书的结论是什么。

相形之下，书中各章节的安排便颇费心思。原来，它们不是按照时间进行的先后次序，而是根据问题的发展而定。事实上，我是根据这个问题的发展，将每篇论文重新分段，加上小节，以松动过分沉重的学术论文形式。那么，是什么样的问题呢？简言之，它不外本书的题目所示：从现象学到后现代。表面上，我是按所了解的 20 世纪西方哲学，将其中问题的发展整理出来；其实，虽然现象学与后现代一前一后代表着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核心。但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百花齐放的世纪里，此刻又有谁能够跨越这之间各种不同渊源，甚至相互抵触的学说，而将这两个议题贯穿起来呢？因此，我要处理的问题不得不缩小其范围为纯哲学性的考量，即这两个分别隶属于世纪之初与之末的议题，凭什么可以连贯起来？

显然，除了一般用哲学史的方式去处理西方当代哲学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把理论还原到问题里头去看，再用问题去看理论。在这个观点下，我所要表达的论旨即：唯有用现象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处理后现代的问题，也唯有透过后现代的议题才能凸显现象学的哲

学意义。

上述的这个理念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有所讨论。因此,也可以说,我的结论早就隐含在书中各章的内容与先后次序的安排之中,读者对此自然会有其个人不同的见解。不过,就一本哲学著作而言,由于这结论不是实际上推断出来的,故不宜以结论形式视之。(为了避免有些读者会排斥对这种类似后现代的荒谬与吊诡,他们不妨把导论当做结论来看,毕竟,导论是我在各章节完成之后,特别为本书所写的。)

另外,本书之所以没有结论,也可以归咎于一些相关的论题尚未处理之故。比如,同时作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本的弗洛伊德,他与海德格尔、尼采并立为当代思维的源起,本书却未曾予以着墨,便是一大缺憾;维护现代主义的健将——哈贝马斯——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是不能轻易割舍得掉的,若不能以专章处理之,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便会坠入现代与传统争执之虞;至于后现代方面,德里达的解构单单从义理上去切入是不够的,完整的说明必须由其文学或文学批评上所示之风格一展其貌;德勒兹与鲍德里亚则被公认为当后现代主义的的灵魂人物,舍弃他们来谈后现代的论述,哲学品味也会失色不少。然而,这些皆因于时间的紧迫,不得不暂时存而不论,有待来日添补。职是之故,在完成这些重要哲学家思想的论述之前,本书亦不适于下定论。

由于本书的结构与各章节撰写时序有密切的关联,亦须在此对其时空背景略做说明。附录中的“二十世纪末的西方哲学”乃 1990 年春天所写的旧稿,曾发表于《联合文学》第 83 期。它和书中的其他章节有显著的落差,却仍不失其连续性。我之所以把它收录于本书之中,主要是因为我会继续处理现代与后现代争论的这些问题,其源头尽在于斯。另外的一个理由则是,当初《联合文学》不知什么缘故

6 从现象学到后现代

把其中的注解全部删掉，而改为一些哲学家的照片。这个做法固然能加深读者的印象，却使得全文支离破碎，让人摸不着边际。经友人与学生的再三反映，我决定借此机会，还其原貌，以补其憾。

其他都是我这一、两年的作品。第六章：“后现代的哲学论述是如何可能的？——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构”，是 1993 年 2、3 月间写的，刊于《哲学杂志》，第 4 期，第 50—66 页。同年五月份应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所办的“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之邀，发表“现代性的两个面向——中国文化迈向未来的主要课题”，作为本书的第四章：“现代性的两个面向——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与韦伯”。除了题目有所更动之外，内容也因主题之故做了局部的变更，少许注释亦随之添加与修正。第三章：“现代与后现代争论的厘清——利奥塔与哈贝马斯争论的发生分析”写于暑假的七、八月份，刊于《鹅湖学志》，第 11 期，第 75—101 页。第五章：“文艺现代性的哲学意涵——本雅明与阿多诺的辩证”写于九、十月的开学期间，则以“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辩证——从本雅明与阿多诺的论辩谈起”为题，刊于《“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创刊号，第 35—50 页。

以上四篇文章均为“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之下所做的成果，当时也是按照这个章节的顺序安排的。不过，在原计划中，我还打算处理福柯的问题，作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对话”结尾，却因时间不够而作罢。本书第七章对福柯的讨论便是去弥补这个缺憾。

第一章：“同质异形抑是异质同形？——从梅洛－庞蒂来看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发表于 1994 年 5 月间，东吴大学举办的第一届“比较哲学”学术研讨会。这篇文章也发生了同样的乌龙。因为主办单位在联系上出了些问题，导致我必须在一个礼拜之内，把才进行一半的文章匆匆结束。为了使我的论点不致也因此被腰斩，本书第二章对海德格尔的讨论便是补充第一章而来。换言之，第七章：“后

现代的哲学论述是什么？——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倒转”与第二章：“海德格尔与后现代——其哲学转向的再议与疏通”，则是1994年7月至10月暑假期间，专门为本书所作的新作，尚未发表过。不过，由于这两章是同时写的，处理方式就会和其他章节不尽相同。我的做法是借此把本书的论旨具体表现出来，但受限于论旨本身所表现的议题，故安排于一前一后，好让彼此有个呼应，也希望如此一来读者会有更清楚的了解。

* * *

本书之得以成形要感谢许多人。首先是“国科会”。1992年，我获得“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的补助(NSC820301H004019)，从九月到次年十月，进行为期一年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对话”之研究。让我有能力聘用龚卓军、梁瑜珊与柯莉纯三位研究生为助理。在这段期间里，他们彼此合作无间，随后并大都能继续深造。如今，本书的出版，可以为这个计划画下完美的句号。其次，特别要感谢的是沈清松教授，除了为本书作序与建言之外，更因为他在过去这几年中，对我一贯的支持与鼓励。系上的另外一些同事对文章的批评与指教，像何信全教授、林镇国教授等，也要在此一并致谢。还有在这本书的编排之中，许多同学辛苦地校对、排版设计、制作索引，都是让我感到欣慰，也是深感谢意的对象。龚卓军指出一处严重的错误，更是功不可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为本书的内容负责。本书自始至终皆由我独力完成与定稿，故一切的责任自然归属于我个人来承担。

最后，要在这里特别声明的是，内人方淑珍女士为了全心照顾慈愉二女，毅然割舍她那份颇有成就的事业，使我能无后顾之忧，排除万难，做出一些研究成果来。可以说，若没有她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导 论

一、何谓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近年来，遍及于西方文化社会各个层面的现代与后现代对话，正不断地侵袭着西方思想界。不少人认为这种对传统思想的挑衅简直是胡闹，因为后现代所言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废话，即便原本有些不是废话，也因为被他们当成废话去处理，而变成废话。不过，令这些卫道之士啼笑皆非的是，如此的废话往往是义正严词地去讲的，或者说，至少是已经严肃到对他们构成威胁，逼着他们不得等闲视之。这么一来，废话又似乎不单纯是句废话了。

于是，什么是废话？什么不是废话？成为一个不得不先厘清的问题。就现代的观点而言，这之间的差别必须在一开始就要严格地划分出来，如果到今天还有这个困惑的话，我们不应气馁，而要更加锲而不舍地继续追究下去。可是，在后现代的眼里，若要真能区分的话，早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如果根本不能区分的话，我们何必如此喋喋不休呢？所以说，它实在是因此抱残守缺之故才变成废话。

吊诡的是，若真是废话的话，让这些废话原形毕露的责任，究竟属谁？现代主义指责这是后现代的错，因为他们不断地质疑理性，却又同时说不清他们质疑的根据何在，以致所有的言说顿时成为废话连篇。可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眼里，这项指责不见得是对他们的贬损，反而被他们视为一种肯定，当做一种恭维去看待：经由这个反讽，始作俑者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就在这交相指责的情形下,双方的没有交集变成一种交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争论的主题于是形成了。那就是说,他们所争论的不是“谁是谁非”,而是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或者说,到底有没有“是非”?然而,这个争论主题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只是因为他们对传统价值规范与道德教条的批判,甚至还怀疑到这样批判的合法性是否也出了问题。所以说一切尽是些废话,而这废话又当真:“是”就是“非”,“非”就是“是”。如此是非不明的情况下,难怪乎一切真实都变得虚幻无比,一切虚幻反而变得栩栩如生。

上述亦即所谓“后现代情景”的写照。这会不会只是一种玩世不恭的闲言闲语?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里,不乏此类愤世嫉俗的言论,何独此时此刻,蔚为一种风气,形成一种抗拒不了的潮流呢?只有问到这个问题,才真正搔及现代与后现代争论的痒处。原来,现代主义企图为这个问题找出一个所以然的答案来,即使这个答案会把问题否定掉,也在所不惜。后现代主义则把问题的重心摆在此时此刻所形成的风气中,若因此不再有任何答案可言,也无所谓。就因为双方如此迥然不同的观点,再加上双方坚持己见,互不相让,才会使问题胶着在无止境的争论中。

平心而论,单单就这个层面而言,后现代是胜于现代的。因为一个没有定论的结论,等于没有结论。没有结论的问题不就是废话吗?然而,这只是个幻觉,尽管是个真实无比的幻觉。因为没有定论的结论,也可以说,是一种结论。它与没有结论的意义不尽相同。于是,针对这层歧义来说,现代则胜于后现代。

可是,这个讲法并非最后的判决。因为在启蒙之后,不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的观点,我们都不再如同古人般,相信代表最后归宿的上帝能为世俗的一切做末日的审判。起码理性与信仰在此不得混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终于为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找到一个

不可或缺的起点：理性。不论现代是如何崇尚理性，或后现代是多么排斥理性，都不能没有理性。只不过在这个现代与后现代争论的脉络中，理性不再是启蒙唯一的代言人。至少今天，包括现代主义在内，没有人会素朴地接受理性。所以，我们可以把现代与后现代争论的起点，进一步地阐明为理性的批判。

然而，什么是理性的批判？它又怎么和废话扯上关系？原来，对现代主义而言，后者是理性批判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唯有根据这个理性规范才能够进行批判的工作。可是，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后者却是理性批判不可不测试的界域，批判工作只能由这种对理性规范继续作批判来推动。职是之故，理性才变成废话。然而，这是不是说，理性原本就是废话呢？上面所谓的“并非最后的判决”，就在答复这个问题。简言之，我们不知道理性是不是废话。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废话去处理，也可以不把它当做废话去面对。但是，前者绝不是句笑话，后者也不是看起来的那么伟大。

的确，对后现代哲学而言，理性之光唯独如此才能无远弗届。可是，对现代哲学而言，这早就在他们的启蒙运动中昭示出来。如此说来，他们之间其实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争论啰？那也不尽然，在没有最后归宿的情况下，我们无权下如此的断言。相反地，对后现代而言，理性的论断正是现代主义走入死胡同的梦魔所在。

对此，现代主义的反驳是说，若不是这样的话，理性的价值又如何浴火重生呢？事实上，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与尼采，何尝不是穷尽各种价值的可能性，才会断言理性；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为理性断言后的僵化，反过来抹杀了他们对理性反省的深思熟虑；退一步说，若不是站在前人的庇荫下，后现代又何曾有出现的可能。至此，现代与后现代争论的轮廓呼之欲出了。